

## 由「80 後」、「90 後」英、台大學看香港的高教發展

提起「80 後」、「90 後」青年，令我不禁想到 1980 年後及 1990 年後分別在英國和台灣興起的「80 後」和「90 後」兩批大學，二者各有特色，值得一談。

### 英、台大學勁增

直到 1980 年代初，英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奉行精英制度。當年，全英國只有 38 所大學，18 歲至 21 歲的中學畢業生之中，僅有約七分之一有機會升讀大學。1979 年保守黨勝選後，戴卓爾（Margaret Thatcher）就任首相，此後連任到 1990 年，十年間推行的一系列基於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政策（人稱「戴卓爾主義」），後來由馬卓安（John Major）內閣繼續施行。這些政策在教育領域的兩大措施，就是改善中小學教育、擴大高等教育，而後者催生了「80 後」大學。

英國增設大學，始於 1980 年代，到了 2000 年，中學畢業生中已有三分之一能夠升入高等院校；待到 2008 年，大學已增至 91 所，加上大學級的學院（university college）和其他專科學院，高等院校總數增加到 132 所。其中的「老大學」通常歷史悠久而表現優秀；「新大學」之中則有不少由原來的理工學院（polytechnic）升格而成。英國政府在 1992 年准許理工學院轉為大學，英國 35 所理工學院幾無例外立即升格，一夜之間令大學數目翻倍。於 2007 年獨立出來的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在 QS2010 年全球大學排名中位列第七，由曼契斯特維多利亞大學與曼契斯特工藝學院在 2004 年合併而成的曼契斯特大學更以擁有 25 位諾貝爾獎得主而引人注目。從 1980 年至 2000 年，英國的大學生人數從 80 萬躍升至 170 萬。

如此情形，令人聯想到台灣。在 1994 年，台灣啟動「教育改革」，措施之一就是「廣設大學」。教育部增建公立高中與國立大學，並鼓勵職業學校、技術學院升格為大學，短期間大學數目倍增。從 1994 年到 2006 年，台灣的大專院校從 50 所增至 147 所；大學生人數由 25 萬勁升到 116 萬，等於原來的四倍有餘。新大學如潮湧現，各家取名一時詞窮，以至於有幾所新大學和大陸著名大學的校名幾乎毫無區分。迄今台灣的大學已超過 160 所，2010 年高中畢業生的大學錄取率高達 97%，「人人上大學」的願望成為現實，有些院系甚至招不到學生就讀。

### 人人讀大學，得失利弊

大學劇增，有利也有弊。英國舊時的大學培養少數精英，有機會入學者多是上層家庭的子弟，此中的階級歧視和社會不公，歷來受人批評。一批「80 後」大學興起，使得學路廣開，平民子弟升讀大學而畢業者增多，擴大了精英階層的社會基礎，理論上可以為科技、資訊、商貿等領域培育更多人材，對英國的社會進步和大眾福祉或許有益。

新大學湧現的背景是「戴卓爾主義」的系列新政，其措施包括壓縮公共開支、經濟私營化、削減並控制社會福利等，因此大學數目劇增的負面影響，首先見於高等教育的經費短絀。在 1989 至 1999 年，政府財政給予每一名大學生的經費減少了 40%，人均開支從略高於 7 千英鎊減少到不足 4 千 500 英鎊。各大學為了節省經費，增加每個教師負責指導的學生人數，教課質素令人擔憂。理工學院的教師原本只須專職教課，但升格成為大學教師後，循例應當同時從事研究；其中年齡較大、未能及時轉型而做到兼擅研究的教師，只好去職讓位。另一方面，從事學術研究的大學教師倍增，令申請研究資助金的人數也成倍增長，粥少僧多，使得經費更形短絀。

台灣的情形，與英國有相似的一面。台灣新大學的湧現，也有當年解嚴後政治轉型、社會民主開放的背景，應「廣設」之運而生的「90後」大學擴大了青年升讀大學的機會。但大學數量急速增多，也使得本已拮据的教育資源更遭稀釋，令台灣高等教育的財政陷於「均貧」狀態，各大學平均所得的經費僅相當於香港的七分之一，拖累了基礎設施的建設、教學和研究的發展。此外，職業學校、技術學院的師資和設備未夠水準，匆匆升格為普通大學不僅失掉了原有的利基，也加劇整體大學教育品質的下降。

### 外地經歷，本港借鑑

不過，台灣「90後」與英國「80後」也有不同的一面。在英國，雖然湧現許多「80後」大學，但高教界仍堅守優質教育宗旨，要求大學從事研究，且擁有極高的學術自主權。政府則力圖證明新措施確實帶來當初承諾的效益，於是政府和高教界設計出大學研究及教學的素質指標、評鑑辦法，並從1986年起對各大學陸續施行多輪素質評鑑。評鑑結果不出所料：「老」大學表現優秀，「新大學」較不如人意。然而正是如此地堅守原則、嚴格評鑑，鞭策優秀大學保持其教學和研究居於前列，新進大學的努力衝刺也給老大學帶來許多鞭策與壓力，整體大學素質不至大幅跌落；如此情景，在本港尤其明顯。

在台灣，廣設高中大學及其實施的教改，自始即伴有民粹意識及平均主義，這一思潮入侵校園，帶來不少負面影響。如今台灣社會已開始省思「90後」成立新大學顯然是得少失多。我曾多年呼籲，高教當局應當導劣扶優，設立相關機制，促使表現不佳的大學合併或關閉，同時對教研兼優的重點大學增加投入資源，大力扶持。如此整頓，將可望獎勵優質大學，並疏導辦學無力的大學及其學生從事其他專業訓練，另闢天地。

由於類似的時代背景和機緣，今日香港也有「80後」出現的大學。且不論是否當年受了英國影響，香港的高教界在1980年代開始擴大到今日政府資助的八所大學，為本港學生增加升學機會。雖說香港中六升入大學的比例未有英、台般泛濫，每年甚至有不少中學畢業生參加會考成績及格仍不能入讀本地大學，但至少大學教育已然普及到一般人家子弟。此外，近年引進的優秀大陸學生和非本地學生為本港的高教提升帶來活力。

告別精英制度，不應轉而奉行民粹；普及高等教育，也不應就此降低大學和大學生的質素。